

李敖
大全集

历史与人像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
大合集

27

历史与人像

历史与人像 教育与脸谱
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

新版《李敖大全集》编撰说明

一、1999年1月,中国友谊版《李敖大全集》(1—20卷)在北京出版。逾年,《李敖大全集》(21—40卷)面世。十载光阴,世事沧桑。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梳理和再编辑,实属必然。

二、新版《李敖大全集》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按“文学与自传”“人物专题研究”“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以及“私房书”和“杂写集”六大主题分类编排,摒弃了原台湾版“合订本式”的编撰方式。

三、新版《李敖大全集》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全面。与十年前出版的“大全集”相比,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

四、新版《李敖大全集》的编撰,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即“只删不改”“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并标明‘编者略’”“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

五、新版《李敖大全集》的编撰,遵循有关规定,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特此说明。

在新版《李敖大全集》即将付梓之际,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

2 | 李敖大全集(卷27)

国大陆出版。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对新版《李敖大全集》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李敖大全集》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12月

新版《李敖大全集》编撰说明/1

《历史与人像》(1 - 153)

自序/3

袁世凯的祀孔

——现代史的一条札记/4

余玠人格品质的分析/8

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

——悼念杜威先生/13

桑格夫人和节育运动/18

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36

行李考/49

“两昆仑”考/52

宋帝始生异象考

——读宋史札记之一/56

宋禁科场书

——考试大全一类的书在宋代是查禁的/61

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

及其效力与手续/64

李易安再嫁了吗? /123

对《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的批评/129

《教育与脸谱》(155 - 301)

序幕/157

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161

师道与是非/168

论“占着茅坑不拉屎”/177



目录

- 关于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
——一些材料/187
- 一封没寄出的信
——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台静农先生/217
- 又一封没寄出的信
——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先生/219
- 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221
- 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234
- 读《虚有其表的考试法》/255
- 蒋廷黻和他走的路/273
- 工作最多的老头子——胡佛/285
- 於梨华和她的小说/292



目 录

《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303 - 405)

- 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305
-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308
- 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332
- 敬答吴心柳先生/360
- “文化太保”谈梅毒/367
- 论“处女膜整形”/376
-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399
- 文化论战的尾巴/404

教

历史
与人像

自序

这本《历史与人像》，包括十二篇文字，是我十一年来有关历史人像的论文和札记的一部分。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是我十七岁（1952年）高中一年级时候写的；最晚的一篇是《李易安再嫁了吗？》，是今年4月写的，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这十二篇文字的主题和写法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环绕在历史和人像上面的，所以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

由于写作时间前后相距十年以上，思想和方法的训练也有不同的历程，不成熟的部分和受传统思路影响的遗迹，当然无法避免，我把它们全部保留了，为了它们究竟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重要过渡。

1963年8月18日在台北

袁世凯的祀孔

——现代史的一条札记

关于袁世凯祀孔的历史,简要年表如下:

民国元年(1912)

3月10日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北京。

民国二年(1913)

6月22日 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

11月26日 袁世凯厘定尊孔典礼。

民国三年(1914)^①1月14日 政治会议讨论袁世凯所交议的祀天、祀孔两案。

2月7日 袁世凯规定祀孔典礼。

2月9日 政治会议决议规复文庙。

9月28日 祀孔典礼。

12月23日 祀天典礼。

民国四年(1915)

民国五年(1916)

1月1日 袁世凯令孔令貽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銜。

6月6日 袁世凯死。

在一个高丽人眼中“乐易英俊”“令人惊叹”的袁世凯^②，自民国元年3月起的四年三个月中，曾以总统和皇帝的姿态，表演了不少复古的好戏。其中最精彩的是郊天祀孔——跟历代的专制皇帝一样的，把一个圣人偶像宗教化。

袁世凯在民国元年4月29日出席参议院，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人民信教自由，举凡各教，均一视大同，毫无偏倚，不论其信教与否，亦不论其信仰何教，均须互相尊重^③。

其实他对“各教”并未“一视大同”，因为他对孔教有了极大的“偏倚”。

先看他在民国二年6月22日《通令尊崇孔圣文》：

立国之本，在于政治。而政治新旧之递嬗，恒视学说为转移。

我中国(之)尊孔子，始于汉武帝：摈黜百氏，表彰六经，自是学说遂统于一尊。顾孔学博大，与世推移，以正君臣为小康；以天下为公为大同。其后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传疏诸家，变本加厉，而专制之威，能使举世学者不敢其出(出其)范围。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为孔子言(立)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

孔子生贵族专制时代，悯大道之不行；哀斯民之昏垫。乃退而祖述尧舜，删修六经。春秋据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之世，礼于小康之上，进以大同共和之义，此其导源。远如颜曾思孟，近如顾黄王诸儒，多能发明宗旨，择精语详，大义微言，久而皆著，酝酿郁积，遂有今日民主之局。

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谥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者，本大总统证以数千年之历史，中外学者之论说，盖灼然有以知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也！

唯民国以人民为主体，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证心理之同。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现在尚未复齐。兹据尹昌衡电称：“请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等语，所见极为正大，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祝(祀)孔典礼，折衷至当，以表

尊崇，而垂久远。值此讹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本大总统维持人道，日夜兢之。每于古今治乱之源，政学会通之故，反复研求，务得真理，以为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唯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蔽——凡我国民，固有责焉。——此令^④！

从上面这件陈腔滥套的“令”文里，可以看出袁世凯在“浅妄者流”“悍然倡为废祀之说”的时候，如何在走向反动、如何在维持旧道德的外衣。

再看他在民国三年的尊孔令，照旧是一片谰言：

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行。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唯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经明于汉，祀定于唐，俎豆馨香，为万世师表，国纪民彝，赖以不坠。隋唐以后，科举取士，人习空言，不求实践。濡染醞酿，道德浸衰。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敝，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而夔舍鞠为荆榛；鼓钟委于草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藩篱而维持不敝？本大总统躬行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

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有心知血气之伦，胥在范围曲成之内。故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

前经政治会议议决祀孔典礼，业已公布施行。9月28日为旧历仲秋上丁。本大总统谨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各地方孔庙由各该长官主祀，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群相兴感，治进大同，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⑤！

这又是掩耳盗铃的谬论了，明明是提倡孔教，却说“绝非提倡宗教可比”，这是多可笑的事！

袁世凯在登极典礼前，曾支出了一大笔孔庙铺设费——原来孔庙内一切桌围帐幔，本用黄缎，因新朝尚赤，所以一律改用红缎，大成殿及两庑都是新制的^⑥，这也算是泽及圣林的外一章了^⑦。

1962年7月1日

注 释

① 当时在美国的一个留学生，曾在他的日记里感慨道：“报载‘政治会议’通过大总统郊天祀孔法案。此种政策，可谓舍本逐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胡适留学日记》民国三年2月4日）

② 见金允植《阴晴史》。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8页。

④ 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50页至第52页。括号部分据《民国经世文编·宗教》四十八《复学校祀孔命令》校改。

⑤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民国三年11月16日《袁氏尊孔令》。

⑥ 黄毅《袁氏盗国记》第139页。

⑦ Reginald F. Johnston 在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 一书的第152至154页写道：“Yüan Shih-k'ai, in his inaugural address, on October 10th, 1913, 'confessed his devotion to the old traditions of his country', and declared that 'he immortal tractions and precepts' of Confucianism 'must not be lightly swept into oblivion.' ”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e sincerity of Yüan Shih-k'ai's homage to Confucius and his teachings, but Yüan himself was distrusted-with very good reason-both by monarchists and by republicans, and his patronage did the cause of Confucianism more harm than good. In his hands, the Confucian system was merely a political instrument. He hoped by its aid to pave his way to the Throne,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use he made of it tended to discredit Confucianism in republican circl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belief that the Confucian system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onarchy rose or fell together.”

余玠人格品质的分析

本文尝试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余玠的“人格品质”(personality traits),故一切史料在此方法运用下只能供作“獭祭”之用。

余玠是湖北蕲春人。《宋史》(四一六)《余玠传》:“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实在他应当是生在湖北蕲州的广济县,故《广济县志·人物志》有他的传,但可惜全部是节抄《宋史·本传》。《湖北通志》(一二三)“人物志一·选举表一”：“余玠,广济人,宋史作蕲州人。赵葵辟如幕府,官资政学士,有传。”

很穷,故在落魄时“向上意志”(striving for superiority)更为明显,所以“喜功名,好大言”。《宋史·余玠传》:“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

幸而有机会受教育,但在气质上,他不是儒生。《宋史·余玠传》:“少为白鹿洞诸生。”《广济县志》卷十四《艺文诗》有《顾景星(黄公)过余义夫先生墓》,中有句说:“孱然一儒者,慷慨成英雄。”其实余玠绝不是“孱然一儒者”,他有躁急(hyperkinesis)和冲动(impulsion)的毛病,并且有体力,所以才会发生殴人致死的事件。

有“太保”性格。《宋史·余玠传》:“尝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出事后又逃掉,足见他鲁莽而缺乏责任感。《宋史·余玠传》:“脱身走襄淮。”

但他很有文才、很有表现(expression)能力,自然会得爱才的人的欢心。《宋史·余玠传》:“时赵葵为淮东制置使,玠作长短句上谒,葵壮之,留之幕

中。”他的长短句，在宋人的词选《阳春白雪》卷七中，可以看到一首《瑞鹤仙》：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

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

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

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因卧，呼不应，自高枕。

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这首词有许多套语犯宋人通病，但收尾颇有力，可见余玠很有气魄。所以很快的，便脱颖而出。《宋史·余玠传》及《宋季三朝政要》卷一互相印证，知余玠发迹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至淳祐二年（1242）；前后不到五年，就向皇帝“进对”了（“进对”的年代据《宋史·理宗纪》校正）。

他的意见很不俗，很有创始性（initiative），所以皇帝很赏识他。《宋史·余玠传》：

进对，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吮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则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帝（理宗）曰：“卿人物、言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乃授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

可见皇帝很器重他的为人（“人物”）和见解（“议论”）。于是他颇为自许，野心勃勃的想有一番作为，《宋史·余玠传》说他：“玠亦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宋季三朝政要》卷二：“奏曰：‘愿假十年，〔当〕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然后归山林，臣之愿也！’”

皇帝被这个“不羁之士”的气派打动了，居然破格用他，给他一个得君行道的机会。《宋季三朝政要》卷二：“余玠者，不羁之士，上于布衣中擢用之。”

(敖按:此处行文有误,余玠当时并非“布衣”,只可说是一个小官。)

他的名声似乎很有号召力,更有助于他“大更敝政”的抱负。《宋史·余玠传》:

[蜀人]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可见他的声望甚佳。他首先设招贤馆,充分表示他应付新问题有适应性(adaptability)。《宋史·余玠传》说:

玠大更敝政,遴选守宰,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供张一如帅所居。下令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言于州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遗谢之。

他对外面的人事也处理得不错,例如名将孟珙等也都喜欢帮助他。《后村先生大全集》(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

[理宗淳祐三年,1243]癸卯春,解[王]夔制置大使事。余玠宣谕四川,过松滋公一见如旧。玠欲荆阆通融事力,公饷以屯田米十万石。

他很有建设的想象(constructive imagination)和战术的眼光,所以他“议案平土,因山为垒”,借以抵抗北方蒙古骑兵可能的突袭,是由大力推行他的营建钓鱼山城的计划。《宋史·余玠传》又说:

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辟召不肯起。闻玠贤;曰:“是可与语矣!”遂诣府上谒。玠素闻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见;与之分庭抗礼。宾馆之奉,[二]冉安之若素有。居数月,无所言,玠将谢之。乃为设宴,玠亲主之。酒酣,坐客方纷纷竞言所长;璉兄弟饮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